



我到北京出差,与万晓援将军见了几次面。每次见面,他都跟我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母亲赵政的故事。他母亲赵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授予少校军衔,是军内赫赫有名的医护人员。同时,母亲还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,配发天蓝色呢礼服上衣,深蓝色裙装和无檐军帽,这种量身定做的军服套装与普通宽大的军衣相比,穿上后会更合身、精神。

万晓援将军说,母亲兴奋地跑到照相馆,穿着新军装照了相,然后便将服装交到箱子里。授衔后,很多人转业了,但母亲舍不得部队,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门诊部当军医。一块儿从上海出来的九名女同学,只有母亲和另一位女同学被授予了少校军衔,还有三人被授予大尉军衔。她们九人当年一起从上海参加革命,但各自的结局却大不相同。

母亲是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,从上海跑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。因为她学过医,便被分配到新四军一师一旅卫生队。抗日战争时期,她参加了苏北苏中根据地反“扫荡”斗争及敌后抗日游击战,负责救治伤病员。日本战败投降后,国民党发动内战,又进行了三年的解放战争。她参加了当时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、第二次涟水保卫战、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等。每次战役下来,大量伤员在短时间被送到战地医院,战士们们的伤情较重,前期以枪伤为主,后期炸伤居多,而且多为开放性且受污染的伤口,几小时内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处理,就会感染。

万晓援将军听母亲说,她记不清自己抢救过多少伤员,也不知道从死神手中,救回了多少战士的生命。为了抢救方便,手术室常会安排在距离前线两公里左右的地方,耳边能听到隆隆的炮声,有时,炸弹就落在手术室附近。战地手术室很简陋,从上面领来的手术器械也很简陋。万晓援将军说,母亲发动全体人员缝制手术帐篷,因为当时大多是在老乡家里做手术,无法达到无菌消毒要求,只能用白布缝制成农舍大小的帐篷,同时制作足够数量的棉花球、纱布、木制夹板等。买到泡手用的搪瓷桶,就请当地工匠用马口铁制作。各种设备都是土洋结合、因地制宜。手术队必须随部队行动,打仗时离火线要近,才能使一线伤员得到及时的手术救治。所以,全队物资装备只能靠人挑肩背。有时大型设备如手术台,无法携带,只能用老乡家里的门板和长凳子架起来代替,长凳高度与标准手术台相差不多。用老乡家里的大蒸笼代替高压消毒锅,大量敷料及手术巾等均用土法消毒,手术器械大多用煮沸的方式消毒,部分器械如手术刀剪、橡皮手套,则用消毒液浸泡消毒。当时要求医护人员的技术必须熟练、准确,包括输液、包扎、止血、固定、缝合、打结等。母亲就和大家一起反复练习,输液、包扎、固定可以在同志之间互相练习,缝合、止血等只能利用兔、猫、狗等小动物练习。练得最多的就是打结,几乎人人手中都有一团白棉线,一有空就练习。

母亲记得最清楚的是莱芜战役,也是华东野战军打得比较激烈的一仗。那是手术队组建后的第一仗,毫无经验,能担任主刀的大夫很少,伤员又多。有一次,母亲连续四天四夜未离开手术室,最后饿倒在手术帐外,往嘴里塞一点儿饭菜又起身接着干;困时,就在助手进行皮肤消毒及诱导麻醉时,坐在手术台旁的小板凳上,支着戴手套的双手打个盹。手术者需用肥皂的刷子从上臂到双手手指刷洗三遍,冲净后再在消毒药水中浸泡,因为皮脂过度清洁,往往容易现出裂口或小疹子,在严寒天气下,手臂泡进冰冷的消毒液中,感到钻心疼痛,这疼痛的刺激能把瞌睡虫赶得精光,是很好的清醒剂。

战争年代,都使用开放式麻醉,用氯仿诱导,后用乙醚往麻醉口罩上滴,十多名伤员麻醉下来,上麻醉的人也差不多被麻醉了,必须及时更换上麻醉的人员。手术队只能及时做清创术,把受污染的、坏死的软组织切除,无活力的骨片、血块、异物等彻底清除,同时可以减少感染,为后期伤口愈合创造条件。野战条件下,这类伤口都不做一期缝合。试想,近千名伤员中有七百多名需进行手术,三台手术同时进行,在最忙的时候,每张手术台每小时约需处理三名伤员。

万晓援将军说,母亲从莱芜战役下来,就随着部队攻占垛庄完成合围任务,继而攻上孟良崮山头。当时,手术队随部队驻扎在孟良崮西南山脚下,为伤员进行手术,一夜之间攻上山头,部队即向东北转移。手术队除留下少数人员继续救治伤员外,全队要于天亮前紧跟大部队由西南方向,越过山头向东北转移。当母亲带领手术队越过孟良崮山头时,大的战斗已结束,西北方向零星枪声不断,当时正下大雨,天色阴暗,敌机尚未临空。但可以看到漫山都是敌人尸体,战马到了跟前都受到了惊吓。为了赶在敌机出动前越过山头,下山接受新的任务,手术队只得加快行军速度,女同志们也顾不得害怕,跨过敌人尸体,迅速越过山头。此时,雨渐停,天大亮,手术队还在山腰时,敌机飞来扫射。孟良崮是寸草不生,更无树木的秃

点开手机屏幕上的“爱家”图标,监控镜头下,母亲正坐在客厅的长条红漆木椅一端,戴着老花镜,头和上身微微前倾,两手不停地忙活着。母亲坐的位置离镜头稍远,手机屏幕变小,我努力辨认了半天,还是没看清母亲面前小桌上堆放的东西,拨通家里的电话,问母亲在忙什么,母亲回答:“快清明了,该给你姥姥、姥爷送些元宝了。”

我从没有见过我的姥姥、姥爷。在我出生前,姥姥和姥爷已先后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我甚至连姥姥、姥爷的照片都未曾见过,这让我每每想起都忍不住有些难过。

有阵子想写写我的姥姥、姥爷,一念至此,随即又生出些许迷茫:思念应附丽于客观存在的实物或是个体的主观记忆,这样生长出来的思念,才像在大地上开出的花朵;我连姥姥、姥爷的照片都没见过,连他们长相啥样都不清楚,又该如何怀念他们呢?我心头涌起一团迷雾,待念头与浓雾一起消散时,最终留下的是浓重的惆怅与失落。

世上有种思念,既无处附丽,又难以言说。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,如果不是姥姥早早走了,她肯定有机会走进校门:“若你姥姥在,哪肯不让我读书呀!哪怕只读上两年,我也不至于当一辈子‘睁眼瞎’呀!”母亲说到这里,叹了口气,那叹息声很轻,拖曳着长长的尾音,好像一片羽毛,在空中左飘右荡,始终不肯落向地面。我理解母亲这一声叹息里难以言说的沉重,以及这浅淡话语里深深的无奈。不识字,是生性要强的母亲一生中最大的遗憾,而在母亲看来,这份遗憾的根源,来自她幼年丧母的人生经历。

姥姥是在1950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离开人世的,虚岁三十六岁,当时母亲六岁,大舅还小她三岁。

山,无法隐蔽,母亲只好命令大家暂且分散,就地在石头凹中躲避,敌机一过,随即下山。那一仗打得漂亮,首长表扬了手术队,大家都激动地哭了。

万晓援将军说,在战争年代,母亲生下了大哥和姐姐,新中国成立后,又生了二哥和他,由于父亲在部队工作,很多时候孩子都是母亲带大的。1945年9月大哥出生,出生后不久,由于部队需转战南北,手术队工作紧张又危险,母亲不得已忍痛将当时不到一岁的大哥,寄养在江苏泰兴一个老乡家中,临别时看着儿子哇哇直哭,心里很难受,但也只能毅然决然地离开。直到1949年3月,战事平稳,才将大哥接回,回来很长一段时间,大哥都不认识爸爸和妈妈。1947年,他姐姐出生,当时母亲一边随部队打仗,一边还要带孩子。母亲说,她的一个叫黄宝生的通信员,用扁担一头挑着行李,一头挑着万晓援将军的姐姐,在战火硝烟中走南闯北,遇到敌机轰炸,好几次都把孩子跌落在田里。就这样,在缺衣少食的战争环境中,孩子们也都长大了。那时,父亲、母亲见面的机会很少,也难得一起看到孩子们。

万晓援将军始终没有对我说,其实在孟良崮战役中,他的父亲万海峰在我军炮火的有力辅助下,带领部队向孟良崮冲锋,让敌人的反攻无济于事,胜利逐步走向胜利。最终,我军胜利全歼74师,国民党高级将领张灵甫挣扎到最后,最终战死。可以说,母亲和她的爱人万海峰,当时一个在前方冲锋陷阵、浴血奋战,一个在后方救死扶伤、通宵达旦。后来,万海峰被授予了上将军衔。

当我问起这件事,万晓援将军却轻描淡写地说,他只想说母亲的这些事,因为战争中的手术队很少有人提过,甚至是一片空白。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,在战争年代,医务工作者的那一份贡献,不能被埋没。

1958年9月,万晓援的母亲再次进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。1961年毕业后,她由一个手术队队长、妇产科主任,成长为一名驻军医院的内科主任、副院长。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,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,坚持系统性学习,提高医术,实属不易。万晓援将军对童年的印象,是大哥和姐姐在北京上学时“无家可归”,到周末,爸妈在北京的战友轮流来接他们到家里吃饭;他和二哥从南方到东北,由母亲带着坐有轨电车玩,脚冻得生疼;下车后,看母亲在湖面上滑冰,母亲有时不小心摔倒了,他们就哈哈大笑,也跟着打出溜儿,乐在其中。

采访完万晓援将军后,我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,下起了绵绵细雨。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八二期

恰逢“七一”,正在刷短视频,突然就被家乡当年家属院的老阿姨们发的小视频震撼了。她们穿着喜庆的大红T恤,在革

命圣地延安的宝塔山下,载歌载舞,满怀深情地唱起了《绣金匾》:“二领陕甘宁,世事多太平,军民大团结,大家一条心……”熟悉的旋律让我情不自禁回忆起了往事。

记得儿时每逢暑假,与爷爷去田间地头,看着日头从地平线缓缓升起,田畴地畔都罩在一片金色阳光里。彼时,爷爷总会放声高唱《东方红》,每当爷爷唱出秦腔的调子,我就尖声大喊:“爷爷你快别唱了,还是让六叔唱。”

六叔那时是队长,与爷爷的地仅一埂之隔。他撂下锄头,用白羊肚毛巾抹一把汗,就干劲十足地唱起来:“共产党,像太阳,照到哪里哪里亮。哪里有了共产党,呼儿嗨哟,哪里人民得解放……”嘹亮的歌声飘荡在庄稼地里,也响彻云霄,飘落在我记忆里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身为司

岁月悠悠红歌情

李仙云

法干警的父辈们,被一批批分配到陕北崇山峻岭深处的荒蛮之地。在那里,他们也以南泥湾精神,唱响了一曲自力更生、艰苦卓绝的开拓之歌。我十岁来到这里,看到一片荒芜的山沟沟,竟被父辈们开垦成了“陕北小江南”,颇有些桃花源源的意境。

父辈们的大生产运动,也被誉为一段不老的传奇。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,场部里

平时母亲很疼我们,可这时她会说:别的妈妈会把孩子搂在怀里,孩呀宝贝地叫;我不会,我觉得不习惯,做不来。自然亲昵的情感表达,在我看来,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能力。小小年纪就失去生母的母亲,少有被大人搂在怀里亲昵的经历,自然也不习惯与自己的儿女亲昵互动。不只是母亲,我也没有这种习惯,一次同事看了我和女儿的合影,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:你就不会和孩子亲,你看,女儿往你身上靠,你呢,身体僵硬得像一根棍子!

同事的话让我反思良久,我明白,我不习惯表露情感,这源于姥姥早早离世,没有让母亲习得这种能力,同时也让我间接失去了习得情感表达的机会。

据母亲回忆,姥姥模样长得俊,身材也好,瘦瘦高高的,很苗条。我问:“是像武寺姨姥姥那样高吗?”母亲点点头。姨姥姥一米六五左右,在那个年代,已是女子里少见的高挑身形。

什么?“非虚构”小说?

这并非我有意故弄玄虚挑起话题,或者无意间混淆虚构与非虚构的概念,而是因为我阅读作家刘益善的最新小说集《碗勺记》后形成的观感。

我是在边阅读边击节赞赏时,形成“非虚构”小说这一概念的。我自己也曾怀疑过这个说法,但随即又必须承认,文学创作不是静止在某种固定范式里。作家永在尝试,永在向前走,才能构成文学的魅力。文学走到今天,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散文可以进行必要且合乎逻辑的虚构,但可能难以理解“非虚构”小说。

小说如何“非虚构”,我们还是看看刘益善的小说文本《碗勺记》。

这部小说集,收录了作家近年发表的20篇短篇小说。至于他是如何决定写这部小说集,又为什么写成“非虚构”小说文本的,以我对作者的了解,只能做如下揣测。作者大半辈子当编辑、写诗、写小说、写散文,浸润文坛数十载,当然是小说创作的行家里手,或者换言之,要比大多数作者更懂虚构文本之本质,他此前的大部分作品,也是中规中矩面对生活,然后用力化掉生活原型,按照小说的逻辑从中提炼故事,调动语言、诗意,处理情节,安排叙事节奏、味道,以期看起来“更像小说”。他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沿着熟悉的路径走下去。

那他现在为什么要尝试创作不那么像小说的“非虚构”小说呢?我觉得其中一定有他的美学追求和对新创作的考量。基于某种追求和思考,他决定打破条条框框,像跨界写作一样,写出不一样的小说。自觉的小说家,谁不想写出不一样的作品呢?也许契机正是从他退休、从主编变回资深作家那天开始的,他终于放松下来,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。我仿佛看到他看着自己铺开的一沓新稿纸笑了,他要写篇小说,要更自洽、更豁达、更随心所欲地写。

黄庭坚赞苏东坡,“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”。刘益善何尝不是行走观览、耳闻目见、酸甜苦辣、嬉笑怒骂,皆成小说呢?通读这部内容丰富的小说集,我时常会惊异于小说“体裁”可以如此丰富多彩。作者将其半辈子积攒的家史、传记、日记、回忆录、采风见闻、历史掌故等熔

到处都回荡着《南泥湾》这首歌。那时,我喜欢随父亲去他同事兰叔家。兰叔是陕北人,乌拉弹唱得精粹透彻,他用“信天游”的腔调唱的那首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,总能让我想起陕北的沟壑山峁。每每在崖上看到这红彤彤的山丹丹花,我就情不自禁想到,它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。

少年时代参加学校的乐器兴趣班,教我拉小提琴的吴老师也是陕北人,我学会的第一首曲子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那年父亲从北京出差归来,我手捧着父亲在天安门前的照片,模仿老师浓重的鼻音用陕北腔边拉边唱,为父亲露了一手“绝活儿”。

那些红歌唱响的年代,让我们感受到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深厚的爱国情怀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,在四处飘荡着的红歌的悠扬旋律中,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,人民幸福安康。

岁才离世的。

“你姥姥梳着一条大辫子,又粗又长,她总是坐在凳子上梳辫子。”母亲说这话时,声音柔柔的,好像春天家乡池塘上柔柔的水波。我的眼前,浮现出一个画面:晨光初现,一个身材曼妙的妇人面窗而坐,头部微微侧偏,随着梳齿轻轻划过,乌黑的长发如瀑布般自肩头滑落。

我希望画面中的年轻妇人能回过头来,这样我就可以看清姥姥的模样了……可是,妇人始终没有回头。我努力盯着妇人的背影看,努力想看得再清楚些,那背影却如水塘上浅浅的波纹一般淡然隐去,很快便杳然无踪……

姥姥离世时,母亲年龄太小,她关于姥姥的记忆,实在单薄。母亲关于姥爷的回忆,则要丰富得多。这些年回山东娘家探亲,闲时陪母亲聊天,母亲曾多次向我讲起姥爷离世前后的情形。

因为姥爷身体不好,母亲那天一整天都没敢出门,一直守在姥爷跟前,连好友来喊她去看她最爱听的戏,她都没有动心。天擦黑,母亲说她饿了,吩咐母亲给她做了两碗疙瘩汤,他把两碗全喝了。这让母亲很高兴,以为姥爷能吃饭,证明病要好点了。天亮前,姥爷又唤醒打盹的母亲,吩咐再给他做两碗疙瘩汤。母亲希望姥爷多吃些,特意往锅里多添了两大碗水。这次姥爷又喝了两大碗。母亲说,早上太阳爬上东房房顶时,姥爷就坐在东房阴凉处的板凳上,这时他的大姐起了信儿来看他,姥爷冲着走进院子的大姐笑笑,起身往堂屋走,走到床跟前,缓缓躺下来,然后人就过去了。母亲说:你姥爷走时,脸上笑眯眯的,气色很好。

按照母亲的描述,姥爷中等身材,人不胖不瘦,做事爽利又干练。姥爷去世的那年春天,家里两个月内接连走了两口人,先是母亲的奶奶,一个月后是我的姥姥。母亲总记得,姥爷在世时,有时会一个人站在

于火炉,然后在传说与现实、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辗转腾挪,游刃有余。比较典型的是与小说集同名的小说《碗勺记》。可以说相关的历史、新闻、人物、事件,都是真实且有据可查的,中山舰、碗与勺的壮烈传奇,萨师俊、钟二十五的英勇无畏,还有发掘者、收藏者的奇迹、奇遇。但最巧的是作者的那支笔,如同一支灵巧的钩针,将上述材料进行编织构思,灵犀一点,匠心独运,遂使之百转千回,成为佳作。

我以为,一部小说,首先是作家活

“非虚构”小说的成功样本

——读《碗勺记》

严辉文



出来的小说。作品要靠写,但在某种意义上也靠活。比如小说集中的防汛系列,没有作者深厚的生活积淀和丰富的采访经历,殊难为也。这些防汛小说,差不多就是一部水利建设、防汛抢险、堤防守护、分洪调度、决口封堵等的百科全书,是一曲关于管涌治理、应急响应、物资调配、巡堤查险、军民共守、干群同心、战天斗地的可歌可泣的颂歌。他的这些小说大多可自成系列,另有收藏系列、古迹保护系列、亲情系列等,全靠作者在他的生活源流里用心探索、发现、打捞、收获。

这样的小说,更容易呈现出生活的原味和文化的质感,也更具有可读性。他在小说中一直与人物“面对面”,唠家常、讲生活,一起喝酒,一起劳作,一起寻找,一起回忆,仿佛在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创作,还时不时蹦出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段子:比如《碑拓记》里的配角人物王家全,20世纪70年代王家全在乡村当知青,向《长江文艺》投寄诗稿,没有得到回复。这个人物后来从乡村走出来当了干部,1998年在赣洲湾守堤时,因内急上茅厕忘记带纸,从厕所砖缝里找到已撕掉一半的旧《长江文艺》,赫然看见一首熟悉的诗,署名正是他自己。而他正是因为那次投稿未见回复,而中断了诗歌写作。嘿,多么幽默又诡异的人

生。还有《药伯》中的主角三伯经典的“时聋时不聋”段子。“那些年生产队做活路,喊他出力做重点儿脏点儿的活儿,他就听不到。队长骂他时,声音很轻,他却听到了,并很及时地回骂一句”,其口头禅是“莫笑人残疾,老子是真聋”。如此“聋智慧”,不只是为了搞笑,实为诠释《药伯》中的主角三伯沧桑起伏、命运多舛人生的文眼所在。

作者那篇充满诗意的《母亲的土地》,更是他“非虚构”小说的力作。是小说,也是散文;是小说,也是诗歌;是文学作品,也是祭母文;是人子的“陈情表”,也是生命的吁天录。“在母亲双膝磨过的地方,就有一片绿色出现。是母亲织出的布?是母亲一腔碧血染就的土地。”“两亩四分田的红花草,明春一定是红艳艳的一团,那是母亲的血液染红的?那也是一片晚霞飘落在土地上?”没有一片血肉的生命体验,没有厚积薄发的创作功力,没有家族情感的代际蓄积,殊难为也。写母亲的文章还有《翻过九道梁》,那是他的“非虚构”小说中最接近“小说”的一篇,作者差不多是再一次实践了海明威的“冰山理论”。母亲需要“翻过九道梁”,找到哥哥,方能逃婚成功,追求自主的人生。实际上作品只是巧妙地写了“翻过一道梁”,另外“八道梁”成了隐藏在文本海平面以下的冰山。就连除主角之外最重要的人物,母亲背后的靠山——“我舅舅”也一直没有出场。小说在留有悬念之后,以一句话结束:“我妈肯定找到了我舅舅,要不就碰不到我当教师的爸爸,也就没有我,也就用不着我妈对我忆苦思甜。”

“非虚构”小说,最终还是小说,作家始终要面对生命的母题、艺术的命题。在这部小说集中,作者洞察生活、烛照人性,书写平凡人物的伤痛、挣扎、呐喊、抗争、奋斗、寻觅和命运沉浮,刻画出生本真的敬畏、笃定、静默和坚韧,讴歌和审视了人类的劳动、创造、价值和尊严。作者着力于人性关照、诗史书写以及心灵探索和救赎,这些同样也是“非虚构”小说的生命力所在。这部小说集,也是作者的非凡经历、文学素养以及创作功力的见证,他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,创作出更动人心弦、更厚重的作品。

太阳出来红满天

——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

赵琼



当人民之灯,祥和之灯,幸福之灯在东方,依次燃起太阳,所有生命共同的母亲总会在至暗时刻升起

太阳出来了
出自高山,出自林间
出自草原,出自海边
只要有朝阳,就会迸发出火一样的焰

让对人民的爱
以同样磅礴的气势,铺天盖地
以奉献和赐予的胸怀
呵护羽翼之下的
每一寸山河
每一亩庄稼

于稳固之中,更加茁壮
在生长之中,尽情拔节
在安逸之中,更加从容
让照亮的每一寸
染上鲜血般艳丽的霞光

在召唤之下醒来。我们都是
自长夜分娩而出的黎明
循着阳光的指引
将每一双充满希冀的眼眸里
那洁白的云朵
与漫过华夏版图的和煦微风
全部化为
幸福与祥和的光芒
在丰收的簇拥下
一步步走向甜梦的葱茏

院子里,仰面长叹:“咋不让我死了呢!”

姥爷这话太过沉重。几十年过去,这句话依然让我觉得心头仿佛压着千钧巨石。我懂得姥爷话里的意思,他不是不想活在这世上,只是心疼母亲与大舅,他希望能用自己的性命换回姥姥,换回这个家庭的平安与顺当。

姥爷终不能换回姥姥的性命,他的生活也无法回到他期望的轨道上。

姥爷是在1963年五月初九离世的,虚岁五十五岁。彼时母亲虚岁十九岁,刚结婚两个月。母亲和父亲是同年三月初四结的婚。

“你的姥姥、姥爷,都活得太少了呀。”母亲的声音里,透着深深的遗憾。

那个年代世事艰难,姥姥和姥爷活得太不容易了。姥姥去世后的十几年间,姥爷心里蓄积了太多的苦闷,他是一个男人,又没处倒一倒这心里的万苦万辛。姥爷走时笑眯眯的——他一定是觉得自此可以解脱了,可以去那个世界寻找姥姥了。

在这世上行走半个多世纪,从没有见过姥姥、姥爷,我心里明白,人生缺憾是常态,可心中却总有一种难言的惆怅。

真心感谢科学家们的“量子纠缠”理论,为我提供了足够有力的慰藉。它让我相信,在那个与尘世相平行的空间里,居住着我未曾谋面的姥姥和姥爷。那空间,被世人以各种不同名称命名。至于这名称具体是什么,并不重要。不过我们都明白:那是尘世上所有人最终都要去的地方。有朝一日,在那个空间,我和姥姥、姥爷终会相遇。这让我有些欣慰。

万籁俱寂的深夜,一烛独明。
有种思念,倘若无处附丽,定是因为无需附丽。
窗外该有一弯纯银色、细如钩的上弦月,还有远远近近不倦闪亮的星——那无以名状的空间,应在万里尘寰的穹顶上……
人世烛,穹天星……

本版题图 张宇尘